

英语在十九世纪上海的社会传播：受众、空间及场域*

司 佳

作为近代的一门主要外来语言，英语在十九世纪上海通商口岸的传播无疑对其城市文化的发展以及语言景观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新旧文化更替、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如何看待外来语言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因而，本文所关注的受众对象，从以往学界讨论的广方言馆、新式学堂以及教会学校的学生，扩展到通商口岸城市中的特殊人群，例如活跃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租界地区的通事、买办、洋行职员等——他们多借助英语交流能力探寻对外商业贸易机会，积累条约开埠后的新兴财富，以提升自己在上海这样的移民都市中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对于这些处在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中的普通人士而言，英语乃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探索新型都市空间以及文化场域。因此，这里所讨论的“英语”内涵，也从狭义的书面英语以及学校教授的正规英语转向更为广泛流传的社会英语，包括洋泾浜英语、商业英语以及实用口语等。随着西方物质文化对通商口岸民众生活的渗透，英语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甚至影响到近代上海方言词汇中部分外来词以“音义并重”的特点而形成；而租界中的双语路牌、商店外景以及广告标示等也充分反映出英语作为十九世纪主要的外来语言对通商口岸城市景观的塑造。

此前关于十九世纪中英语言接触的学术研究，多将英语作为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讨论，而基本上没有关注其跨区域传入本土后的社会反响。然而，近几年关于英语在全球史语境下的研究则显示出殖民地时期英语对于本土文化的转型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例如，金斯利·博尔顿（Kingsley Bolton）在 *Chinese Englishes*（《中式英语》）一书中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出当代香港英语与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的历史联系。他用复数形式的“英语”（Englishes）以表现香港地区的英语与历史上其他殖民地英语——比如，亚洲、非洲与加勒比海“地方化的英语变种”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将这些国家及地区不同样式的“英语”置入后殖民研究以及文化遗产的思想语境中。¹ 在处理华人海外移民与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这一关键问题上，梅·纳依（Mae Ngai）最近发表的文章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由于语言问题，政商、法律界出现了一些新兴职业。比如，对华埠流传的洋泾浜英语进行再次正规化的“翻

* 本文的研究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科专项基金项目“19世纪以来上海的物质、空间与现代性建制”的经费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¹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pp. 1-3.

译”——这不仅是华人译员所具备的一项特殊语言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以及族裔群体中‘中产阶级’形成的一种企业策略”。² 纳依的研究将语言接触相关课题进一步扩展到语言需求与资本市场这一问题上，并关涉到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与主流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利益。这一观点，或许可以为研究者所借鉴，进一步讨论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商人英语、语言身份(linguistic identity)以及社会流动三者的关系与互动问题上。

一、“洋泾浜话”与“露天通事”

1843 年上海作为沿海通商口岸开放之后，“洋泾浜英语”即成为当地中国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行话。在中文史料中，“洋泾浜”除了其本义地名以外，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此后一百年左右许多当地人讲的一种“中式英语”(Chinglish)。这一贸易混合语的历史同时反映出上海开埠以后的早期历史文化样貌。姚公鹤作为当时旅居上海的文人，于二十世纪初的随笔中回忆了这种贸易语言的特点，并曾描述过其影响范围之广：“洋泾浜为不中不西之一特别话，沪上尽人所知者。”³ 而十九世纪初出现在地图文献中的“洋泾浜”其实是个地名，乃黄浦江的一条主要支流，介于老城厢的北面与英法租界之间。⁴ 由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洋泾浜地区的商业贸易变得十分繁荣，洋泾浜一词的指代区域也随之扩大——不仅指河流本身，而是指沿河周围中国人与外国生意集中的地方。王韬在其笔记中就称“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如“流离世界，肩摩毂击”。⁵

因此，这种文人笔下“不中不西”之“洋泾浜”贸易混合语，有其地名文化史的名称来源。我们知道，在语言学专门术语中，“洋泾浜语”的英文是 *pidgin* 一词；然而，中文的“洋泾浜”却并非本来就是语言学名词，也不是相对应的音译词。从这一地名发展到后来的贸易混合语名称，除了由于“洋泾浜”一带是上海开埠后中西贸易最集中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即在上海通商口岸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通事扮演了重要的贸易中介角色。这些作为“洋商传话”的中间人，是最早有能力充当口译的人员群体。因而，他们所讲的那种单词和语法都不甚标准的“英语”就被记成了“洋泾浜英语”。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在中文文献中出现大约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情——此前十八至十九世纪外国人旅行见闻中所记录的西文材料相关词条多用的是 *pigeon* 或 *pidgin* 等发音

² Mae M. Ngai, “‘A Slight Knowledge of the Barbarian Language’: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Late-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p. 23-24.

³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 18 页。

⁴ 周振鹤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第 70-71 页。

⁵ 王韬《瀛壖杂志》，第 110 页。

接近 *business*（生意）的词汇。⁶ 因为他们大多认同这是一种中国人跟外国人“做生意”使用的行话，而广州贸易时期的中国商人却往往对这个词发音不准。

早期在中文文献中被称作“露天通事”的口译人员多数祖籍广东，是上海开埠以后跟随最早一批广州迁至上海的洋行买办们而来。⁷ 这些人所讲的洋泾浜英语亦能在其语言历史上回溯到十九世纪初传教士笔下的“广东行话”。⁸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这种贸易行话自然也很快被商人、通事等使用者们带到了北方。姚公鹤在其随笔中还抄录了一些有关“洋泾浜话”的具体细节：

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尔，以中国文法出之也。相传业此者三十六人，名曰露天通事。……与外国水手及初至上海之洋商购买食物，则若辈自愿为之向导，而从中渔利者，此沪上相传之旧说也。⁹

这条史料不仅指出了当时洋泾浜英语的语言形态，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早期在上海被称作“露天通事”的人数规模、行业性质，以及他们使用这种贸易语言的地点场合。此外，姚公鹤还回忆到这种“露天通事”类似于一个专门的行业团体：“露天通事以无赖著名沪上。……其实凡匪类秘密之结合。”¹⁰ 葛元煦在其 1876 年的《沪游杂记》中说，“若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如多一人，必致争殴。”¹¹ 类似的记述不仅见于文人随笔，在当时上海竹枝词中也有相应记载，比如“露天通事”的规模通常只局限于所谓的“三十六”人；“额中不死不添人”等。¹² 将这些史料结合来看，这里的“三十六”更多地扮演文学修辞功能，而并非特指恰好三十六人——并暗示着仅有一少部分所谓的“专家”由于某种技能或可在该领域谋得厚利。露天通事依靠口译能力谋生；因此，作为贸易行话的洋泾浜英语也多是家传或行业内部小范围流传的本领，这与前面讲到的十八世纪西方旅行记中描写——“精明的中国商人们会把他们的儿子送来作仆人，以便能习得一些英语，进而便有资格和欧洲人进行贸易”这种情况有几分相似。¹³

对于上海开埠早期流传的“洋泾浜话”之语言形象问题，中文文献欠正面评价。姚公鹤这样的士绅文人将“洋泾浜话”视为“露天通事”向外国商人谋取虚高利益的欺骗性手段。而王韬也在其笔记中写下：“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

⁶ 前一个词 *pigeon* 事实上是一个对读音的误记，并没有“鸽子”的意思；然而，十九世纪后期由于英美报章上有关远东贸易及贸易通用语的信息流传渐多，也有人甚至是欧美人自己误会其含有与鸽子存在某种联系的“鸽子英语”的意思。

⁷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pp. 60-62.

⁸ Samuel W.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4 (1836): 428-435.

⁹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 18 页。

¹⁰ 同上。

¹¹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 22 页。

¹² 杨勋《续述别琴竹枝词五十首》，《申报》1873 年 3 月 13 日。

¹³ Charles F. Noble,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 p. 224.

可致”。¹⁴ 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利。甚有数百文之物，竟报价至一、二元者。西人性情亢直，不之疑也。……沪人鄙而贱之，呼为‘露天通事’。”¹⁵ 葛元煦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游记中提到，“露天通事”因“衣多露肘，无家无室”而得名。¹⁶ 此外，“露天”这一称呼也表明这些人的职业并不稳定，没有持久的专业性，也可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史料显示，从广东来的此所谓“露天通事”三十六人很快失去了其行业统治地位；而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了做生意开始讲英语。1855 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之后，大量江浙一带的富商家庭涌入上海，其资本刺激了开埠以后上海中外贸易的发展。¹⁷ 据大概的统计数字，1847 年上海仅有 39 家外国洋行，而到了 1867 年底，来沪商人大概成立了 200 家新洋行，其中大多是由英国人运营的。¹⁸

每家洋行都需要一些中国人充任贸易翻译并帮助外国人处理日常事务。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口译人员中，买办因掌握与茶和丝绸有关的生意知识而享有较高声望地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买办乃跟随洋行来到上海的广东人，是茶叶生意方面的专家。¹⁹ 与此同时，在参与中外贸易的过程中，广东买办也将他们的贸易行话带至上海，形成十九世纪流传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语言基础。而研究显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些熟悉丝绸生意的浙江商人（大多来自宁波）也加入了买办行列。王槐山是首位服务于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杨坊则成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第一位宁波籍买办。²⁰

二、英语入门词汇小册

简单的词汇手册是这些宁波商人、买办最初学习英语的关键途径。1860 年，冯泽夫等五名宁波商人自筹资金，在上海出版了用宁波话标音的洋泾浜英语小册《英语注解》。²¹ 笔者所见此书之 1860 年上海守拙轩初刻本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共九十叶（一叶为两页），分上下两册，木刻线装本。目录含三十九个不同的标题门类，概收录四千多个用汉字注音的词条及洋泾浜用语。编者在序言中写道，“兹奉谕旨，准予各口通商，中外贸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语不通，虽善于经营者，未免齟齬。吾邑藉于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习学，然亟欲习学英语者，

¹⁴ 王韬《瀛壖杂志》，第 8 页。

¹⁵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第 126 页。

¹⁶ 葛元煦《沪游杂记》，第 22 页。

¹⁷ Ernest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pp. 54-62.

¹⁸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pp. 424-451.

¹⁹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50-51.

²⁰ 李坚《上海的宁波人》，第 51-52 页。

²¹ 周振鹤先生最早对这种词汇手册有细致研究，所用版本为自己架藏，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本可能不完全一致。见氏著《逸言殊语》（修订版），第 98-100 页。

亦苦无门可入耳。”²² 因此，该书出版之目的，正是为了能够帮助提高当时在沪上宁波买办们的英语能力，以期获得更多与外国商人进行“中外交易”的机会。但是，因之前并无类似教材在同乡中流传，所以这些甫抵上海的宁波商人坦言，似很难找到学习英语的入门途径。在序言中，编者还提到在“中外通商”之前，十三行贸易“皆用粤人为通事”，而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后，“通事者仍系粤人”之局面。宁波商人初至上海后，先是借用了一册原以粤语注音的《英话》小册作为初始读本；然而，因出自广东籍通事之手，“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因此，张宝楚、尹紫芳、冯对山、郑久也、姜敦五等几名宁波会商便“釀资注英话注解一书，注以勾章乡音，分门别类，使初学者便于记诵。”²³

勾章是宁波的古称——这些宁波商人、买办们将原来广东对外贸易所用的洋泾浜英语小册改以家乡话注音，并通过商业行会筹资出版，为自己同乡有能力立足于五口通商后的中外贸易助以一臂之力。有意思的是，虽然开头部分引入了被称为“行书大字”与“行书小字”的英语二十六字母表（见图1），单词部分也是正规英语拼写；然而在读音方面，由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仍缺乏与外语学习接轨的罗马字注音体系，所以用的就是所谓“勾章音”的汉字方言注音。如，地名部分即“各国镇头门”——中国（China）即读作采纳，“合众”（United States）读作尤乃脱司推之，“佛兰西”（France）则读成勿兰司，很能够反映宁波话的特点（见图2）。在后几个部分的句型表达中，则可以体现出这仍是一本由不正规的语法将单词“串连”起来的洋泾浜英语小册。比如，问题“你从前做什么生意”写成洋泾浜英语为 *You before to do what business*；表示希望某人好运“你近来甚好运气”对应 *You just now very good chance*。这两个句子皆乃缺乏词序以及动词时态、变位的洋泾浜表达。不过，就像序言中所说，即便这部小书不能算作正式教材，它仍可以作为初习英语的本地商人与外国人会话交流的书面途径，使贸易沟通更为便捷。《英话注解》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另有重印本，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实用价值。

十九世纪中后期，类似《英话注解》这样的英语学习小册开始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出现，并在商人群体中流传。虽然还不是正规的英语表达，然而相对来说，它使非正规的口语洋泾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书面介质，同时也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辅助工具。对这类词汇小册作整理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上海的通事和商贸口译人员是如何通过书面材料学习洋泾浜英语的。相较于此前学者们研究过的十九世纪初期流传于广东沿海的《红毛通用番话》小册等，《英话注解》在内容分类更趋完备。《红毛通用番话》在广州的两种木刻本仅九葉或十葉（一葉为两页），只有“生意数字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及“食物杂用门”四个门类。²⁴ 而《英话注解》多达九十葉，分“各国镇头门”、“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秤尺什件门”等共近四十个门类，其内容大多与贸易知识有关，包括食物、植物、数字、金属、重量、货

²² 冯泽夫《英话注解》，序言。

²³ 同上。

²⁴ 内田慶市、沈国威编《言語接触とビ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第241-273页。

币(中国银两和外国钱币)、度量、税金以及进出口货物等。在这些基本类别中,编者还创造出一种特别的词汇分类,即把日常词汇短语分为二字、三字、四字和五字,以方便记忆。如“合同” *make agree charter*、“招牌” *sign-board*、“章程” *regulation*、“欠长” *too short*、“灵验” *effectual* 等词都在“二字语门”的一页中并列,尽管后两个词与前三个词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见图3)。最后一栏“长句语门”则为学习者提供了简单的对话样式,即便这些句子大多乃是洋泾浜英语表达。比如“我未懂你再说一遍与我听”译作 *I not know you talk again let me know*,并用汉字注音。而另一句“这事情阿有错” *This affair have mistake?*——不仅英语是洋泾浜句式,而且“阿有错”三个字组成的疑问式也可以体现吴语方言口语的痕迹(见图4)。综观这一“门”的特点,编者试图通过反复使用句型表达的若干关键词和短语(通常是副词或疑问式,如 *just now, what price* 等)来加强与外国人对话交流的技巧。因此,《英语注解》等洋泾浜词汇小册不仅富含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通事如何使用英语的宝贵语料,同时也反映出中外贸易交流中洋泾浜英语的实用价值。除了上海本地人士为了学习英语而编写的诸种小册以外,洋泾浜英语也是当时来华外国人需要熟悉的商贸通用语,甚至包括母语是英语的英美商人。因此,来华外国人所著之旅行记、导游手册或专门著作中也有对十九世纪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记录。

三、传教士与上海英华书馆

作为近代的一门主要外来语言,英语在上海通商口岸的传播无疑对其城市文化的发展以及语言景观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其中,外来语言的传播路径除书面表达的文本介质以外,教学场所空间及相关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问题亦不可忽视。从某种程度而言,“机构化”对应的是语言学习的“正规化”(standardization)倾向,也使中英语言接触这一历史问题逐步趋向“去洋泾浜化”(de-pidginization)的进程。从受众的角度考察,十九世纪中后期进入上海私立英语学校的学生多是通商口岸的“新富”阶层,即商人、买办家庭。1865年,上海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由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开办,随即吸引了不少这样的上海商人家庭子弟。作为首任校长兼主课教师,傅兰雅在第一学年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当时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也许出乎意料,这里已有十人在接受英语教育,且还会有更多人通过朋友关系进入学校。这些小伙子不出意外都是有钱人和家世好的中国人的儿子,如银行家、买办和商人等,……他们的平均年龄概十三岁半”。²⁵至1866年5月,已有二十二个日校学生和二十个夜校学生,年龄在十岁到十八岁之间。英华书馆当时的学费是每年五十两白银,按傅兰雅的记载,相当于十六英镑。²⁶按平均每月支出四两多白银作为培养学费,这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上海已算是非常昂贵的花销了,并非普通人家所能够负担的固定开支。在1867年的“第二次报告”中傅兰雅

²⁵ John Fryer, “First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o F.R. Gamwell, 1865.”

²⁶ John Fryer, “Letters from Shanghai, May 21st, 1866.”

又提到，“迄今为止有三十五个学生入学”，并指出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在上海定居经商的富裕中国家庭，或是有名望人家的儿子”。²⁷

在这三十五个学生中，有十八人来自广东，六人来自宁波，五人来自苏州，其余六人则来自其他不同省市，如福建厦门等。随着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这些早期在传教士开办的私立学校中进修英语的学生籍贯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通商口岸新兴资本权力的地域分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更多原先在“十三行”从事对外贸易的广东商人和买办们为拓展更大的中外市场而举家迁至上海——因而，广东人继续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来自宁波、苏州和其他江南各地的移民群体也通过行会、同乡组织在上海逐步发展起茶叶、丝绸、糖业和银行借贷方面的生意。²⁸ 有意思的是，由于上海英华书馆的学生皆来自不同地域的新移民家庭，教习英语还需以他们各自的“方言”背景分班——傅兰雅将之比作“绝妙的巴别列塔”。²⁹

在英华书馆，中国学生需兼修英语和中文。傅兰雅也注意到学生们无法同时在两种语言上取得进步。一些中国学生学习中文经典传统实则为了应付彼时于读书人心中仍有一定地位的科举考试，却无法从中汲取实用经商的文化资源，做到两者兼顾。因此，傅兰雅提出，“学校的中文课程必须限定在更基础的科目范围内，…[比如]信件格式、常用信函以及写作的简单科目”。³⁰ 这一方面是为满足通商口岸买办家庭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则显示出西方传教士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意欲绕开当时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推行的主流价值观念，即后来张之洞在他《劝学篇》中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傅兰雅作为主讲教师，在1865年的“第一次”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学生们的日常英语学习情况。通常，课程计划大致为四个小时，偶尔会根据学生的程度不同作些许调整。第一个小时“是高强度的口试和笔试，内容是学生在家复习过的之前课文。”第二个小时的课程“要学习二十五个新词及解释”。第三、第四个小时一般会安排写作、算术课程。³¹ 虽然，英语对于当时上海商人家庭很有用，但也仅止于生意场上的实用工具而已。因此，在傅兰雅的课上，很少有学生能够最终胜任中英文的书面翻译工作。

四、 结语

在近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推动了新的“语言身份”的形成与认同，并与传统文化或国族身份的认同存在特定的区别与联系。在前人对上海洋泾浜英

²⁷ John Fryer, “Second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o F.R. Gamwell, 1867.”

²⁸ Susan M.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pp. 73-96;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pp. 60-62.

²⁹ John Fryer, “Letters from Shanghai, May 21st, 1866.”

³⁰ John Fryer, “Second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o F.R. Gamwell, 1867.”

³¹ John Fryer, “First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o F.R. Gamwell, 1865.”

语的语言学研究基础上,本文作者更致力于探讨语言交流的话语权以及“说话人”主体(通事、译员等群体)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语言身份”与社会流动等问题。这类问题在十八世纪“广州贸易”期间已经显现,于十九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城市中更为突出,如本文对英语在十九世纪上海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群体,即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使用者”及其“语言空间”的研究。上海作为条约开埠以后外国人最早聚居的中国半殖民地城市,在中外新移民的互动交流作用下,逐渐呈现出一种由洋泾浜混合语发展而来的“新型语言景观”,并使“本地人”的生活空间随着“语言空间”的扩大而获得进一步拓展。在这一新型城市空间中,通事、买办等传统地位低下的民间商人群体亦逐步获得更高层面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可。及至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外局势的变化以及清政府对外语教学的重视,洋泾浜英语在学堂之中渐趋“正规”。说英语的中国人不仅视外语为交流工具,且将其认作一种探索西方文明与外部世界的抽象介质,在译词和外来语中探寻所谓“现代性”出路。由此,历史上的“中国洋泾浜英语”超越了其语言学意义本身,并体现了中外交往过程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社会文化关系。

附:参考文献

冯泽夫:《英话注解》,上海:守拙轩,1860年。

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1876年原版)。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1883年原版)。

李坚:《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内田慶市、沈国威编:《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东京:白帝社,2009年。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1875年原版)。

杨勋:《别琴竹枝词并序》,载《申报》,1873年3月3日。

——.《续述别琴竹枝词五十首》,载《申报》,1873年3月13日。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印本(1917年原版)。

周振鹤:《逸言殊语》(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Bolton, Kingsley. *Chinese English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Fryer, John. “First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o F.R. Gamwell, 1865,” and “Second Report, 1867;” “Letters from Shanghai, 1865-1871,” In the John Fryer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auser, Ernest. *Shanghai: City for Sale*. Shanghai: The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 1940.
- Jones, Susan M.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In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3-96.
- Ngai, Mae M. "'A Slight Knowledge of the Barbarian Language':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Late-Nineteenth and Early-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30.2 (2011): 5-32.
- Noble, Charles F.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 London: T. Becket & P. A. Dehondt, 1762.
- The 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04.
- Williams, Samuel Well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4 (Jan.1836): 428-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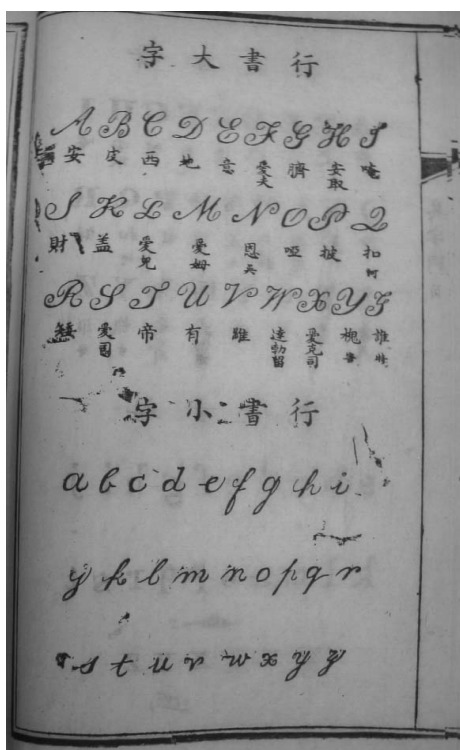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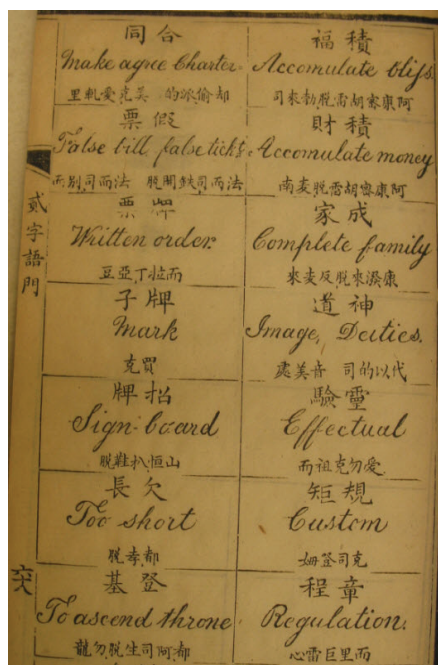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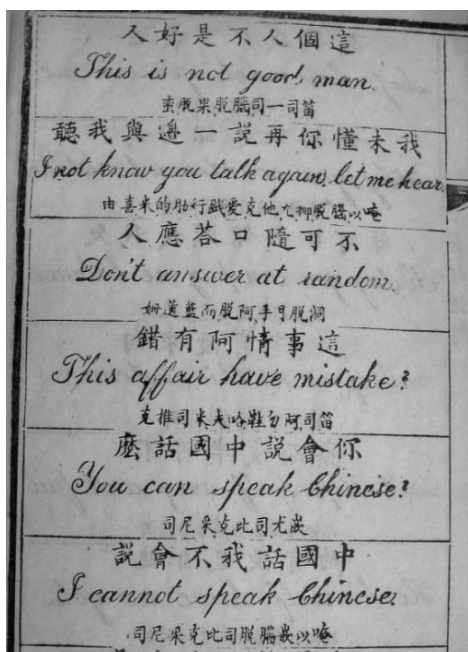


图 4